

吴仁宝走了,华西理念还活着

何勇 乡镇机关公务员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农村基层干部的杰出代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范带头人,原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8日18时58分逝世,享年85岁。(3月19日《新华日报》)

曾经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最有名的农民”吴仁宝在2011年说过自己想要干到88岁。然而,天不遂人愿,老书记没能干到88岁就离中国乡村建设而去,没能亲眼看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将在全国开花的新时代。我们怀念吴仁宝老书记,不是说我们必须学习和复制华西模式,而是要学习和发扬老书记留给我们的华西理念,就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共同富裕!

很多人只要提起华西村,除了羡慕华西人有钱之外,就是主张学习华西模式,想要复制华西模式。然而,实践一次又一次证明,任何一个乡村发展模式都有自身固有的特点,都必须根据自身实际走出自己特色、特有的道路。华西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范例,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一种样板,成为“中国第一村”,虽然主要在于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发挥效应,但是,华西村的成功离不开其特定历史时代的偶然因素,与那个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华西村有一位全国大多数乡村没有和难寻的“有理想、有魄力、有远见,具有真正的大智慧与大境界”的英明、勇敢的老书记吴仁宝,这是华西村成功的内因和关键所在。换言之,这些华西村特有的内在因素就决定了华西村成功模式不可复制。虽然华西村模式不能复制,但

是华西村成功的经验可以学习,那就是根据村庄自身实际和特点,建立符合村民素质和村庄实际的村庄管理机制,寻找出适合村庄自身发展的道路。其实很多人批评华西村搞世袭制,吴仁宝的4个子女支配着村庄90%的资金,但是这正是华西村成功的特有道路,也只能属于华西村,正是这种模式让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发展成了“天下第一村”,而且持续几十年而不衰。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吴仁宝老书记,还是华西村的继任者,都一直反对华西模式这种观点,也不主张其他村庄学习和模仿华西模式,不支持走华西村的这种世袭制道路。

实际上很多人羡慕华西村,表面上是羡慕华西村人有钱,实质上是羡慕华西村的共同富裕生活。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今天,共同富裕无疑是绝大多数人向往的

生活,即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共同富裕理念和生活依然拥有强大魅力。事实上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前提,脱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要建成一个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不太可能。从这个角度说,华西村目前的共同富裕生活还不能复制,但是华西村的共同富裕信念、理念可以复制,华西村共同富裕的模式可以学习!

吴仁宝老书记走了,但是他奠定的华西理念还活着,这也是老书记留给全国乡村建设者最宝贵的精神遗产,需要全国的乡村建设者发扬光大。我们有理由相信,走了一个“农民英雄”吴仁宝,全国乡村在国家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将站起千万个像吴仁宝老书记一样的“农民英雄”,建起千万个华西村,带领中国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政企分开后铁路票价未必“非涨不可”

范广阔 职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铁道部的“集权体制”是中国铁路发展、强大的最强有力的驱动器。“分开后,火车票价肯定要上涨,甚至可能超过飞机票价”,“铁道安全必然受影响,而且铁路建设的投资速度会放缓”。(3月18日《中国经济周刊》)

王梦恕院士的言论,最为引发公众关注的,还是他关于政企分开后火车票价肯定要上涨,甚至可能超过飞机票价的言论。因为这和最广泛的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出行方式,出行成本息息相关。

在铁道部政企分开方案刚确定的时候,就有网友担心拆分后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会以市场化为借口而提高铁路客运和货运票价。实际上,除了“市场化”的借口之外,铁路总公司还有一个现成的涨价理由,那就是还债。这几年铁路大发展给铁道部带来了总额高达

2.66万亿的巨额债务,随着政企分开,这笔巨额债务也相应地被转到了铁路总公司的身上,如果身为企业的铁路总公司以还债为借口提高票价,似乎也说得过去。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想说,政企分开后的铁路票价,未必“非涨不可”,即便要还债,也不一定非要通过“涨价”的方式来还。目前铁路运输主要由货运和客运两部分组成,政企分开后铁路总公司的利润,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获得。

先从货运来看,我国运输费用占GDP比重已经世界第一,当前国内企业无不在想方设法减少流通运输成本,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效益,在这种时候,刚刚完成政企分开的铁路总公司如果轻言提价,对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也不言而喻。如此一来,不但企业不答应,政府也未必会同意。相反,如果铁路公司能够秉持“薄利多销”的新策略,适度降低货运价格,则铁路货运的竞争力将大大提高。很多以前选择公路、水路货运的企

业,都将投向铁路运输的怀抱,货运量的增加不但能够帮助铁路总公司占领运输市场而且能够大幅度提高企业的市场效益。

从客运票价来看,虽然之前铁路部门多次表态目前铁路客运票价偏低,不符合市场规律。但与此同时,一些线路的高铁列车,却因为票价严重“贵族化”而导致“空跑”现象严重,备受公众诟病。这时候再提高票价,高铁乘客只会更少,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亏损也会越来越严重。更何况,作为国有企业,铁路客运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属性,既要顾及经济效益,也要顾及社会效益,一味地涨价,与公益属性和公众意愿相悖。

那么,与铁路货运薄利多销是一个道理,如果高铁能够放下身段,通过适当降低票价、浮动票价来提高高铁列车的上座率,增加公众乘坐铁路旅行的“性价比”,则不但能和公路客运争夺客源,还能和航空客运争夺客源,客源有了保证,收入和效益自然也就有了保证。

企业科技创新不能再吃政策“哑巴亏”

杨红兵 教师

如果珠海安生医药知道有一项政策叫“研发费税前扣除”,去年一年就能减税125万元。珠海市科协近日发布《珠海市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与资本融合状况调查报告》,数据表明,若采样群39家企业都吃透政策后,去年一年可多减税约1082万元。(3月18日第3版《珠海特区报》)

科技创新是兴企强市的战略举措,也是提升珠海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动力。要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必须走科技研发突围之路,而产品的研发和设备的更新除了需要一批科研人才还需要资金

的后盾支撑。没有资金投入,科技创新就是镜中花、水中月。资金是确保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如果资金供应链断裂,那么再先进的科研成果也无法在珠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因此,对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企业来说,资金就是维系正常运营的血液,一旦血液不能正态循环,企业生产经营就会出现危机,所以,将每分钱的使用效益最大化,这是确保企业走好、走稳科技创新之路的关键之举。

可眼下珠海科协数据调查着实让人大吃一惊,39家企业一年因为相关政策宣传不力或者企业主动了解甚少,导致多交税千万,对于那些渴望金融资源

向科技领域配置的企业来说,可谓吃了一个哑巴亏,这笔资金如果节省下来,说不定就可以拿下一个科研攻关项目,或许过去一年有的企业就因为资金供应不足而影响了企业科技研发进程。

要避免以后企业再吃政策“哑巴亏”,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各项有关科技创新的优惠政策或扶持政策的宣传力度,把各类政策以及政策范例汇编成册送到企业,定期召开企业的政策培训与宣传会议;另一方面行业协会要发挥资源共享、政策信息协助传递的功能,定期将政府各项优惠政策反馈给公司,发挥一些吃透企业优惠政策的企业的传帮带的功能。

渔民纳入养猪产业链的荒诞

水易寒 职员

浙江嘉兴,很多捕鱼人转行捞死猪。在新丰镇,村民说一年四季都有人捞猪,当地从鱼米之乡变成“猪的水乡”,抛猪入江原因多是猪得传染病。3月15日下午,嘉兴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全市未发现动物疫情,同时也公布了近一周内收集的死猪数目:3601头,相关地区的水质正常。但渔民们认为政府造假,“这几天埋的死猪可能有几万头。”(3月19日《潇湘晨报》)

从最初的黄浦江发现死猪900多头,到现在的突破万头,数字不断增加,但不变的永远是嘉兴官方的那句话:相关地区的水质正常。这个逻辑被“黑得深不见底的河水”无情嘲弄着。

这个姑且不论,因为还有一个现象更荒诞:很多渔民不再捞鱼了,他们慢

慢转行,以捕鱼的技能来捞死猪。也就是说,渔民也被“市场”纳入了养猪产业链,而且是产业链的最后一段。

养猪和捕鱼,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现在居然成为畸形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关系。实际上,渔民们转行捞死猪,纯属无奈。

嘉兴曾有过相当长时间养猪业的勃兴岁月,由于地处上海、苏州、杭州的三角地带,这些市场的需求刺激了养猪量的大幅增长,并形成了养猪户、贩猪经纪人、饲料商、兽药商、运输户、批发零售商等养猪业产业链,但彼时养猪业牵涉太多的人群和利益,渔民的利益完全被忽视。猪粪、死猪污染河流逐渐侵袭渔民的生存空间,渔民们为此多次上访,但政府部门的回应却是:“反映问题基本属实。但大部分流通水域水质还好。河水变黑发臭的原因,可能是恶劣天气形成的,是暂时的。”

就这样,直到河里彻底没有鱼,但因

为渔民的技能还在,他们捞猪的水平显然比别的人要强,于是怪诞的现象发生了,原本利益受剥夺的一群人,被“收编”捞猪。

整个过程,渔民的声音被压制,直到上万头死猪漂到了黄浦江,事情才从源头一点一点倒推,暴露了整个逆淘汰的过程。

一个地方适宜养多少猪,对环境危害几何,对其他群体的利益是否存在潜在侵害,这需要政府部门早期就进行科学规划和评估。从渔民转行捞猪的逆淘汰过程来看,嘉兴政府部门一直存在责任缺失、措施不得力、目光短浅等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被动。

从这个荒诞但残酷的样本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群体之间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群体的利益被忽视,导致隐患越埋越大,最后很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链的崩溃,导致所有人的利益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征信业管理条例”引导社会诚信建设

蚩蚩苑 职员

我国酝酿十年之久的首部征信业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3月15日正式实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日前披露,珠海已建成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公示平台、企业融资增信平台等系统。(3月18日《珠江晚报》)

随着我国首部征信业法规《征信管理条例》的正式实施,以及全国各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企业融资增信平台等系统的建立,预示着我国整个社会的诚信事业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些征信平台中,最为引起公众关注的,就是个人征信系统,虽然名字听起来略显专业,但实际上却和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息息相关。

具体说来,如果某个人在信用卡的使用,房贷的偿还等金融生活领域存在不良的信用记录,那么就会被这个个人征信系统“记录在案”,而且会被保存长达数年的时间。一旦公民的个人信用有“案底”在身,那么今后再申请银行的信用卡,以及申请车贷、房贷等各项商业贷款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被银行予以拒绝,进而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和麻烦。

由此可见,《征信管理条例》以及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首先是对公众的一个善意提醒,提醒我们要重视个人信用

记录,要在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具备诚信意识,坚持诚信行为。而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近年来,随着社会诚信事业建设的发展,以及公众信用意识的逐步提升,前往人民银行各城市中心支行查询信用报告的市民越来越多,呈逐年递增态势。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社会现象,说明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重视个人信用记录,开始有了更高的社会诚信意识。

与此同时,条例的实施和征信系统的建立,对企业的意义也不言而喻。在《征信业管理条例》的引导之下,很多地方开始着手建立地方企业融资征信平台系统。随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接入当地企业的征信系统,那些在平时融资和经营活动中讲诚信、守信用,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今后将更容易得到银行在资金信贷方面的支持,更容易在企业资金紧张的时候完成金融融资,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发展壮大。

“让讲信用者得实惠,让不讲信用者受损失”,当这样的理念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得到公众普遍的认同和彰显,则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才会看到希望。一个社会整体诚信风气和诚信氛围的形成,显然不能依靠某个人或者某个企业的力量,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当企业诚信了,个人诚信了,则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才会看到效果,见到起色,也才有利于社会整体诚信风气和诚信氛围的形成。

“最低消费”需要最高监管

张玉胜 老干部

“点多了吃不完还浪费,点少了又达不到最低消费标准。”近日,有市民致电本报称,贵阳部分餐馆的“好位置”设了最低消费标准,使不少想清静用餐的市民只能硬着头皮消费,最后吃不完,而且浪费。(3月19日《贵阳晚报》)

尽管餐饮业的“最低消费”行规早已备受质疑,但年复一年,争论依然、行规依然、消费依然。究其原因,关键是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甚至找不到明确的主管部门,商家与消费者各执一词,各级政府又缺乏明确的权威表态。面对“反对浪费”遭遇“最低消费”的现实尴尬,人们期待国家对“最低消费”有一个明确的属性界定,并给以法治化、规范化的系统监管。

“最低消费”缘何大行其道?面对社会对“最低消费”属“霸王条款”的指责,商家的辩解振振有词:一是经营者对高档包厢装修成本和专项服务开支需要成本补偿;二是部分消费者久占豪华包厢却花费少、耗时长,其导致的资源亏损需要弥补;三是在商家对“最低消费”条款进行事前提示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默认当属你情我愿的平等交易。也许正是基于对商家这些貌似合理的搪塞解读,政府部门才始终三缄其口,广大消费者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

其实,商家的上述理由并不值一驳。首先,豪华装修属营造就餐环境和招徕顾客的必要投资,其成本收回应从餐饮经营的正常利润中弥补,规定“最低消

费”无异于对消费者变相的二次牟利;其次,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受自由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的规定,消费者到饭店就餐应当可以自由选择座位,而“最低消费”条款阻碍人们对这种选择权的自由行使,属有悖公平交易原则的强制性消费。至于以此警示花费少、耗时长的个别消费者云云,更是对所有进入包厢的消费者进行以偏概全的“有错”推断。

退一步讲,即使可以吧最低消费解释为你情我愿的双方自愿,但所谓“最低消费”的保底价码也应当由经营者和消费者协商而定,岂是你定我行的单方面行为。更为悖理的是,“最低消费”不仅是背离了人们消费意愿的霸道行为,更违背了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的社会发展趋势。人们的消费水平取决于自己的财力、口味和饭店的经营质量,为了凑足“最低消费”数额而不情愿地多点和点贵,势必导致不必要的浪费,更会助推讲排场、摆阔气的奢侈之风。因此,无论是从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公平交易秩序出发,还是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引领勤俭节约之风考量,“最低消费”的餐饮行规都应当予以坚决取缔。

对“最低消费”说不,不能指望经营者的行业自律,也不能寄望于消费者的用脚投票。必须通过完善制度法规,明确部门监管责任,健全问责处罚机制等多个层面入手,廓清社会认知误区,界定餐饮行业规范,营造崇尚节俭氛围,以遏制“最低消费”为突破点,将反对“舌尖上的浪费”进行到底。